



李叔同



弘一大师影像

陈星
编撰

上海三联书店

李叔同

弘一大师影像

陈星
编撰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叔同：弘一大师影像/陈星编撰.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7. 8

ISBN 978 - 7 - 5426 - 5925 - 5

I. ①李… II. ①陈… III. ①李叔同(1880—1942)—传记—
图集 IV. ①B949. 92 -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6316 号

李叔同——弘一大师影像

编 撰 者 / 陈 星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 - 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9 × 650 1/16

字 数 / 50 千字

图 片 / 120 帧

印 张 / 14.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925 - 5/B · 529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 - 52601369

李叔同——弘一大师(1880—1942),文学家、书法家、金石篆刻家、画家、音乐家、戏剧家、艺术教育家、佛学家、现代高僧。1880年10月23日生于天津。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又号漱筒。父李世珍,清同治四年进士,官吏部主事,后引退经商。自幼饱读经书,涉猎甚广。支持变法维新运动。1898年奉母携眷迁居上海。入城南文社,所作诗文为同人之冠。1900年自编《李庐诗钟》《李庐印谱》。参与创办上海书画公会。1901年秋,入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等。其间参与戏剧活动。1905年出版《国学唱歌集》,为中国近代学堂乐歌奠基人之一,初秋赴日本留学。1906年初在日本创办中国第一份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同年秋入东京美术学校,与同学共同创办“春柳社”,次年上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开中国话剧之先河。1911年3月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12年春在上海主编《太平洋报》画报副刊,同年秋起在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后改校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艺术教师。1913年创作中国第一首合唱歌曲《春游》,1914年在中国首用人體模特进行美术教学。学生中英才蔚出,其中有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潘天寿、曹聚仁、李鸿梁等。1918年出家为僧,云游四方,刻苦研律,为中兴南山律宗之第十一代祖师,被誉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1942年10月13日在福建泉州圆寂。

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

李叔同，1880年10月23日生于天津，自述浙江平湖人。其父世珍是清朝进士，做过吏部主事，后经营盐业。李世珍前后有妻妾数人，其原配姜氏生有文锦；续弦张氏生有文熙，字桐冈。其后李世珍又纳妾王氏。李世珍68岁时，王氏生下了李叔同，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又号漱筒。1884年9月23日，李叔同的父亲病故，卒年72岁。

父亲病故后，家境日趋衰落，但母亲对叔同的蒙学教育却要求很严，对儿子的前途也很关心，而二哥文熙则担当起了他的启蒙教育责任。据文献记载，李叔同从小读过的古书很多，但同时还习词学篆刻品戏练书画，涉猎广泛，而且在读四书五经的同时，还学过新学。他曾学过算术和洋文，可谓紧跟了时代的潮流。1897年，他曾以童生的资格应天津县儒学考试；1898年又应考天津县学。

李叔同于1897年18岁时遵从母意，跟在天津经营茶叶的俞氏家族

中的俞姑娘结婚。1898年秋，李叔同离开天津，奉母携眷迁居上海。李叔同离开天津的原因，按其子李端在《家事琐记》一文中的解释是：“据说，因当时先父曾刻‘南海康君是吾师’的闲章，此行有躲嫌避祸的意图。而实际上，据我家的老保姆王妈说，我父亲当时的南下，是想从此脱离开天津这个大家庭，去南方扎根立业。因当时我们家资富有，上海也有我家钱铺的柜房，可以照顾我们一家的生活。”李叔同年少才盛，旧学新知又一应俱全，他到上海后不久就加入了“城南文社”。“城南文社”是一个切磋诗词文章的团体。他加入文社后立即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几次评诗，均获好评。他除了写诗文外，也参加美术活动。1900年3月，他会同友人在上海福州路杨柳楼台旧址组织“海上书画公会”，后出《书画公会报》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李叔同参与了该报的编辑工作，也曾在报上刊登过自己的书印润例。他自编了《李庐印谱》《李庐诗钟》，其影响正如同他自己所言的那样是“二十文章惊海内”。

李叔同与当时许多名士一样，也有过一段寄身声色情场的公子哥生活。然而，寄身于声色情场只是暂时的，他的事业抱负使他不甘心仅浪迹于声色场上、藏身于艺妓歌郎们的深宫闺阁之中。1901年秋，李叔同考入了南洋公学特班，成了蔡元培门下的高足。1902年，李叔同曾先后参加了浙江和河南的乡试，均未能成功，仍回南洋公学就读。在学业上，李叔同的成绩十分出色。他写过《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强调了弱国的生存惟有自强自立之一途。南洋公学重视外语学习，而李叔同在这里也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基础。为宣传民权思想，李叔同还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1902年底，南洋公学爆发学潮，不久，李叔同离开了南洋公学。李叔同曾在上海圣约翰书院任教国文，又参与沪学会活动。李叔同26岁那年（1905年），母亲病故。他以

新式葬礼办完母亲的后事，即于该年初秋登上了东渡的轮船赴日本留学。

二

1906年初，他在日本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此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创举。这本杂志虽然只有26页，但却有众多的栏目，如：表纸、图画、插图、社说、乐史、乐曲、乐歌、杂纂、词府等等，其分类甚详。《音乐小杂志》的序言不过几百字，但文字优美，涵义深邃。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翳夫音乐，肇自古初，史家所闻，实祖印度，埃及传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腊，乃有定名，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泉达，瑰伟卓绝，突轶前贤。迄于今兹，发达益烈。云瀚水涌，一泻千里。欧美风靡，亚东景从。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这里所谓的“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此可看作李叔同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见解。

1906年9月，李叔同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的撰科，学习西洋画。因为与同学曾延年志趣相投，两人于1906年底发起组织了“春柳社”。此为第一个话剧团体。1907年春节前夕，“春柳社”演出了《茶花女》选幕。这是该社首次公演。1907年农历六月一日正式演出《黑奴吁天录》，因其剧本系曾延年所撰，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的开端。

1911年3月，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回国后，他先在天津做了短期的图画教师，1912年春转赴上海，又在城东女学做了短期的教师后即被聘为《太平洋报》主笔，并负责画报副刊。他参加了“南社”，发起成立

了“文美会”。1912年秋,李叔同应邀到杭州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校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新办的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任教。1913年,李叔同创作了中国第一首合唱歌曲《春游》,发表在由他自己编辑的《白阳》杂志上。《白阳》杂志的全部文字由他用毛笔书写石印。在该杂志上,他还发表了《今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说》等。这种广泛介绍西洋艺术的作法,在当时国内艺术教育界是一个创举,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学校美育杂志的发轫。李叔同在中国最早提倡人体美术教学,是最早使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教师。1914年,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美术教学中使用了人体模特。

李叔同在任教时期创作了一批堪称中国学堂乐歌典范的校园艺术歌曲。李叔同任教时期是他的学堂乐歌创作的黄金时期。无论从创作数量和歌曲的艺术水平上看,他在这一时期的歌曲作品,皆是他歌曲创作中的精品,代表作《送别》即是此时期的作品。在创作手法上,他擅长借景抒情;在配曲方面,他又喜欢采用欧美流行曲调,同时也进行创作,如《春游》《留别》《早秋》等。

在杭州任教时期,李叔同将人格教育与艺术教育紧密结合,体现了一个真正艺术教育家的风范。才情加人品构成了李叔同的人格力量。他的才情自然使众多学生折服。同事夏丏尊评价他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李叔同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艺术家和艺术教育人才。所谓桃李满天下,这是李叔同自己直言不讳的。为师者,解惑授业也!这方面他做到了,而且做得十分出色。李叔同

出家后在书信中说过：“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数，私心大慰。”李叔同当年培养的学生众多，仅就艺术文化方面的人才而论，就有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潘天寿、李鸿梁、曹聚仁等。

李叔同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他有一份入社时写的小传：“哀公传：当湖王布衣，旧姓李，入世三十四年，凡易其名字四十余，其最著者曰叔同，曰息霜，曰圻庐老人，富于雅趣，工书嗜篆刻。少为纨绔子，中年丧母，病狂，居恒郁郁有所思，生谥哀公。”这份小传被认为是李叔同加入西泠印社用的个人资料。小传中的“当湖王布衣，旧姓李”句中也可作为研究李叔同的祖籍问题提供线索，即李叔同有可能因母亲是平湖人而自称“祖籍平湖”。

李叔同在杭州任教不久，即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恳请李叔同赴宁兼职，于是他杭州、南京两地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1916年夏日，夏丐尊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断食的修养方法》的文章。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杰出人物，如释迦、耶稣等都曾实行断食修炼。还说断食可以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又列出了实行断食过程中的种种注意事项和方法，继而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夏丐尊把文章介绍给李叔同。李叔同决心一试。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我于日本杂志中，看到有说关于断食的方法的，谓断食可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李叔同实行断食的地点是虎跑。虎跑有大慈定慧禅寺，俗称虎跑寺。李叔同的原意只是来试试断食后的感觉，并无其他更多的期望。但他亲临寺院，对僧人的生活却是更加亲近起来。对

于这次断食，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是这样评价的：“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吃的菜蔬，更喜欢吃。……这一次我到虎跑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断食后，李叔同经常去拜访国学大师马一浮。在马一浮的开导下，他开始阅读佛教书籍，并于1918年正月十五日皈依了佛教，法名演音，号弘一。为了一心一意念佛，李叔同提前结束了他在学校里的课程，并且完成了学生的考试。他开始整理在家时的俗物，将作品、书籍等分送各方，还特意把一包平生收藏的篆刻移交给西泠印社，同人将此封藏于壁中。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正式出家为僧。

三

弘一大师在受戒时获得了马一浮赠送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宝华传戒正范》。起初，弘一大师学的是“新律”，即唐代义净三藏所译的“有部律”。后来，他听取了天津徐蔚如居士的意见改研“南山律”。南山律宗以唐代道宣律师为祖，“南山律”依《四分律》而成，又稍有变化，最适合中国僧众的根器。所以，他发愿要振兴南山律宗。他觅得弘教律藏三帙，又从日本请得古版《南山》《戒疏》《羯磨疏》《行事钞》以及《灵芝》等苦心钻研。1921年正月他又披寻中国佛教律学古译四大律之一的《四分律》来研究。由于《四分律》戒相繁杂，记诵十分不易，他又以非凡的毅力编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并于1924年定稿。对于这项工作，虽然只是他研律的开始，但他仍感到十分欣慰。为此他在序言中写道：“……编录数章，颇喜其明晰，便于初学……数年以来，困学忧悴，因是遂获一隙之明，窃自幸矣。”此后，他讲律、宏律、研律、著律乐此

不疲。

弘一大师又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用丰子恺的话来概括：“他的字，功夫尤深，早年学黄山谷，中年专研北碑，得力于《张猛龙碑》尤多。晚年写佛经，脱胎换骨，自成一家，轻描淡写，毫无烟火气。”李叔同皈依佛教后，曾一度表示不再从事任何艺术，专心念佛。而事实上，他出家成了弘一法师后，各种艺术均未彻底废弃。其缘由，则可以从书法说起。李叔同皈依后不久，托杭州友人介绍，结识了嘉兴的范古农居士。范古农《述怀》一文对此的说明是：“民国七年师将出家，大舍其在俗所有书籍笔砚以及书画、印章、乐器等于友生。道出嘉兴，持杭友介绍书见访，垂询出家后方针。”李叔同与范古农见面后，即返回杭州，并于该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在虎跑寺出家。农历九月，出家后的弘一大师在灵隐寺受戒，次月则就又与范古农相约在嘉兴见面。弘一大师到嘉兴后，许多知情人当然明白他是一位大书法家，竞相求其墨宝。弘一大师起初为难，他对范居士说：“已弃旧业，宁再作乎？”范古农以为无妨，他说：“若能以佛语书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亦佛事也，庸何伤！”弘一大师听后以为有理，遂请购毛笔、瓦砚、长墨各一，先写一对联赠给精严寺，另凡相求者一概满足他们的要求。按照范古农的说法，弘一大师出家后“以墨接人者，殆自此始。”实际的情况是，李叔同出家后，除了以书法与人结缘、以法书弘扬佛教外，依然从事艺术之事。这在许多文献资料中都有记载。准确地说，李叔同出家后，是“诸艺未废，唯随缘耳！”当然，他出家后，所从事的艺事多与佛教有关，而且书法影响最大，数量也最多。人们常用“高山仰止”来形容对弘一大师文化行持的崇敬，若如此，他的书法实可谓是此座大山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晚年的弘一大师在闽南度过，除了他自己所说的：“厦门气候四季如

春,又有热带之奇花异草甚多,几不知世间尚有严冬风雪之苦矣!”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此地佛教界内部较为纯洁,佛教教育的风气也十分浓厚,有益于宏法的大事业。他意识到这正是他弘律的大好时光。他有宽广的宗教胸怀,以为平生对于佛教,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因为他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抗战时期,他自题居室为“殉教堂”,曰:“为护法故,不怕炮弹。”这一时期,他多次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加跋语:“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弘一大师 60 岁后,仍像孤云野鹤一般地奔走于各方。1942 年 9 月,虽然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月,他仍然在为弘法作着最后的努力。10 月 2 日,他为转道、转逢二老写大柱联,又为晋江中学学生书写中堂百余幅。这之后,身体遂觉得不适。他已真正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这之前,他开始向教内外的友人作种种最后的告别。

弘一大师临终前曾给老友夏丐尊和学生刘质平留下了相同内容的遗书:

朽人已于 月 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仅达,不宣。

前所记月日,系依农历。又白。

弘一大师写好之后,把它交给了随侍在侧的弟子妙莲法师,嘱咐他将来填上日期后分寄给二位。他还写下了最后的墨迹:“悲欣交集”。

1942年10月13日晚7时45分,大师呼吸急促,8时正圆寂。

四

对于李叔同——弘一大师这样的一位业绩辉煌,人生道路变化多端的大师级人物,他的文化行持自然成为了各时期人们议论和评说的对象。尤其是对于李叔同的出家原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研究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即便是在李叔同的那个年代,也是社会上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如在20世纪40年代初,容起凡写有《弘一大师出家的研究》一文,郑重的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记得吴稚晖先生曾说过一句话:‘李叔同可以做个艺术家而不做,偏去当和尚。’有许多人对于这句话是具有同感的,稍微知道弘一法师(李叔同)的身世历史的人,都以为这位对图画、金石、音乐、文学、戏剧都曾有着浓烈的兴趣和高深的造诣的艺术家,这位风流倜傥的浊世佳公子,这位曾经从事革命、办过报纸的同盟会老党员,为什么在中年以后竟舍弃一切事业和作为,而悄悄地倔强地皈依到佛门去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实在是一个‘谜’,要探索这个‘谜’的谜底确是件不容易的事。假如能以社会科学的眼光于弘一法师身世、环境、个性、学术、思想等等来下一番精透深刻的研究,或可得到了解与结论,但是,这种工作到现在似乎没有人整个系统地在做(至少是还没有发表贡献出来)。”弘一大师本人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讲述了他出家的客观经过,可谓十分详尽。但他并没有道明其在主观上的原因。弘一大师毕竟是弘一大师,他的影响广大而深远,今人有对他出家作出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的要求。

丰子恺对老师李叔同的出家曾有的“三层楼说”。李叔同出家后,许

多人都发出了疑问：“他们的意思，大概以为做和尚是迷信的，消极的，暴弃的，可惜得很！倘不做和尚，他可在这僧腊二十四年中教育不少的人才，创作不少的作品，这才有功于世呢。”丰子恺认为：“这话，近看是对的，远看却不对。用低浅的眼光，从世俗习惯上看，办教育，制作品，实实在在的事业，当然比做和尚有功于世。远看，用高远的眼光，从人生根本上看，宗教的崇高伟大，远在教育之上。——但在这里须加重声明：一般所谓佛教，千百年来早已歪曲化而失却真正佛教的本意。一般佛寺里的和尚，其实是另一种奇怪的人，与真正佛教毫无关系。因此世人对佛教的误解，越弄越深。和尚大都以念经念佛做道场为营业。居士大都想拿佞佛来换得世间名利恭敬，甚至来生福报。还有一班恋爱失败，经济破产，作恶犯罪的人，走投无路，遁入空门，以佛门为避难所。于是乎，未曾认明佛教真相的人，就排斥佛教，指为消极，迷信，而非打倒不可。歪曲的佛教应该打倒；但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接着，丰子恺追问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入学校？为了欲得教育。为什么欲得教育？为了要做事业。为什么要做事业？为了满足你的人生欲望。再问下去，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丰子恺的结论是：“所以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丰子恺在这里颂扬的是“真正的佛教”，而非被歪曲了的佛教。所谓“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即追问一个人活在世上的人生理想与诉求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哲学理念，不同世界观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崇高伟大的理想和诉求不外乎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民生

的幸福和为最广大的民众谋利益。主义和信念的崇高，成了所有先进（或称进步）政党、阶级、社会团体等等的追求。而在“真正的佛教”看来，普渡众生、舍己而谋求大同则是他们的基本教义。这一种教义，在一部分乐意为此而献身的人看来是值得追求和向往的。李叔同就是这样的一类人物——尽管并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像他们这样做——正像还有许多人选择了别样的途径一样。如此说来，李叔同的出家，自然有了在他看来是极有价值的勇敢行为。1948年11月28日，丰子恺为厦门佛学会作过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丰子恺说：“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为何这样说呢？丰子恺接着发表了她的见解：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

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丰子恺认为：“……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隐。文艺好比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大，喝花雕不能过隐，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按照丰子恺的认识，李叔同的出家，完全出于“脚力大”者对人生追求的自然渐进，是一种人格的完满和升华。丰子恺还认为：“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之所以说丰子恺的论断是比较符合李叔同性格发展的趋势，这倒不是将丰子恺的观点视为评判艺术与宗教的真理，而是说以这样的观点来审视弘一大师这个个体较为贴近实际。首先，李叔同是一位注重人格感化的教育家，他强调“文艺应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用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中的话说：“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们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内心。他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生真心地怕他，真心地学习他，真心地崇拜他。”丰子

恺又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说：“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育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出家后的李叔同仍是如此。他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中说：“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是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其次，李叔同是一个万事皆认真的人。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一文中引述夏丐尊对弘一大师的评价是“做一样，像一样”。丰子恺进而解释说：“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艺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缘故。”有了这种要做什么就要像什么的执著精神，人们就不会奇怪当李叔同在夏丐尊那里看到介绍断食的文章后一步一步按照要求去实行的事实，就不会奇怪他在杭州虎跑寺里见到出家人的生活后内心充满兴趣而又一步一步研究佛教直至出家的行为轨迹。这原本就是他性格的必然发展趋势。弘一大师曾将自己的出家行为视为生死大事。这生死大事是什么？那就是李叔同在物质、精神生活都满足了之后，要去探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正是有了如此弘志，他才把财产、子孙、名利等视为身外之物，把学术文艺也看成暂时的美景，甚至以为自己的身体也是虚幻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探究人生根本的问题，弘一大师没有理由去过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完全可以依仗自己的名声，借机自树一帜，可在佛门中谋求一个显赫的地位。然而弘一法师没有，他既不曾高树法幢，广收徒众，示现大法师的威仪，也不曾发起什么佛教团体；既无佛门中之职衔，也没有党政要人、闻人大亨做他的徒弟、护法。他是那样淡泊，孤云野鹤，一心念佛。这样的认识，就需要人们从